

# 忆刘大白墓地保护

黄亚洲

《文化交流》杂志的编辑要我回忆一下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刘大白杭州墓地的保护情况,于是一朵记忆之云就渐渐地飘入了脑海,越积越浓。

那朵云里,一位面目清秀的老太太首先清晰起来。这位老太太在一九九〇年八月上中旬的某一天,寻着了位于建德路九号大院内的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驻地,并且走上二楼,进了我所在的办公室。记得那天很热,但老太太面容很浓。我请她坐,她不坐,一直坚持站在我的办公桌一侧,原来是有事相求。

她说她叫刘缘子,是刘大白三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七八年前就与两个姐姐开始奔走求助于相关单位,希望为自己父亲的墓重建墓碑,加以修缮保护,因为文化大革命运动前夕墓碑被砸碎,坟墓被平毁,现在连墓地都被一家单位圈进了围墙,几近湮没了。但七八年来,姐妹三个的这一请求一直无处落实,而不久前,杭州市又发了文件,要再一次大规模清理西湖景区内的非保护坟墓,偏偏刘大白墓这一次也是没有列入保护名单,那就意味着不知什么时候这个地底下的墓就会被彻底掘掉。

老太太说,现在两个姐姐都走了,她自己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如果我也死了,这个要求就没有人再提了,我们的子女们看来也不会有人再出面了,所以趁我现在还活着,我请求你们帮帮我,挽救我父亲的坟,不要被清理掉。”

大体上就是这么一个请求。我听着,当时就动了恻隐之心,因为我毕竟也是一个写诗的,有点明白刘大白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地位。在新文化运动中,刘大白可是一位响当当的新诗闯将,许多诗作呼吁关注民间疾苦,别具一格。他一九二四年就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新诗集,还

是那位翻译过《共产党宣言》的浙江老乡陈望道为诗集写的序,一出版就很轰动。哪怕这位刘大白先生后来来到南京当了民国政府教育部的常务副部长,也是写诗不倦,照样有诗集陆续出版,当然还写其他东西,如文学评论之类,直至一九三二年逝于病榻。

年过半百不久,便驾鹤西去,想来真是可叹。自然,更可叹的是连坟墓都要在三十多年后以“革命”的名义平毁。时代真的是没有诗意。

老太太走了之后,我就寻思着赶紧安排时间去一趟法云弄,那是灵隐寺上方的一条小径,幽静得很,我以前走过那条路。但作协办公室的几位同志议论起来,就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这件事其实属于政府部门的管理范畴,我们没法管,作家协会是为当代会员提供服务的,那个刘大白虽说也是中国文人,但一九三二年就离世了,让我们今天来忙碌这个事算什么名堂?另一种意见认为刘大白毕竟是名诗人,那老太太也可怜,现在既然没有什么单位来挑头解决这件事,我们作家协会出面劳一下也未尝不可,一旦坟墓真的掘了就晚了。我自然持后一种态度。省作协分管我们办公室工作的领导李秉宏也是这个态度。

我当时具体负责省作协的办公室工作,从嘉兴借调到杭州才八个来月,办公室的几位同志最终还是很配合我工作的。记得几天后,我就带上负责财务行政工作的李华明以及驾驶员,接上老太太,一起往灵隐寺方向出发了。小车顺山坡蜿蜒驶上法云弄,按刘老太太的地址找,就找着一家围墙围着的单位,一看牌子是杭州市城市雕塑研究所,进去后也没见有几个人。刘老太太

指着院子后面的一处空旷之地,说有点像这里是。

我们四周察看,除了一堆石膏废料的堆放处,周遭找不出任何像是墓地的痕迹。于是我们走近那处石膏塑像制品的废料堆,但见都是断手、断脚、断头,各种形状的残缺件,堆成了一座小山。难道墓穴会是在这个地方?既然周遭没有其他痕迹,那就只能探索这一废料存放地了。记得我当时跳了下来,趴低身子,把手掌贴着地面,使劲往废品堆的缝隙里曲曲折折伸手进去。李华明担心我的手被压着,又担心废料堆会轰然崩塌伤着我,一个劲叫我小心。

只记得我的手慢慢伸长伸平之后,再往下慢慢抠,忽然就摸到有硬硬的平整的石板,于是大叫“摸到了摸到了”。凭我直觉,墓地无疑。

此时,老太太看方位也越看越像,说可能就是这里了。后来《江南》杂志的编辑陈继光在记叙这一经过时,很有诗意地说:“黄亚洲终于用他写诗的手,在法云弄六号杭州市雕塑院内一片堆满废弃雕塑的荒草丛中,摸到了这位六十年前的诗人的墓石。”

回到单位后,我便向单位的领导盛钟健、李秉宏汇报了这次探寻经过,建议以作家协会名义,赶紧向杭州市政府打一份报告,请求简易修缮刘大白墓地,以便让这座墓能在大力清理西湖景区墓地的背景下得以保护。单位的两位领导态度十分明确,说就这么办。后来我就起草了一份文件,题目好像是“关于简易修缮爱国诗人刘大白墓地的函”,编上号,作为正式文件发出。记得是当月下旬发给杭州市政府的,为保险

起见,还多发了几份,分别抄送给市长与副市长,也抄送了市园林文物局、省文物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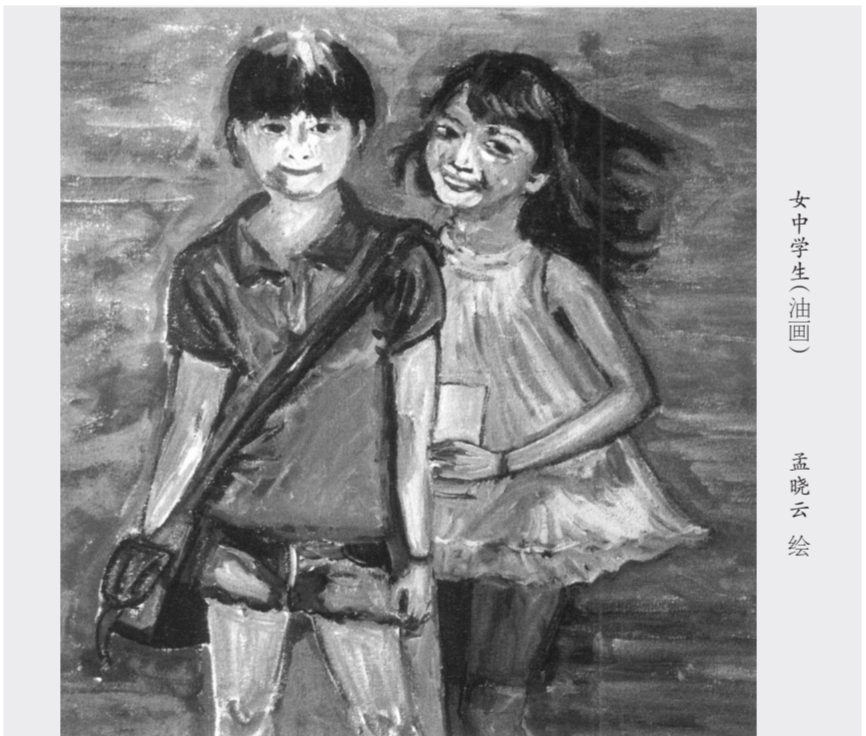
因为杭州市当时的副市长是著名的散文家俞剑明,我还直接跟他通了电话,请他关注此事,尽力帮助解决。

后来得知,杭州市园林文物局的态度也是很积极的,一个多月后就向市政府办公厅发出了“同意简单修缮墓地、清理杂草、重建墓碑”的公函,而市政府秘书长施锦祥在同一天就批示“同意”,并作出“墓碑高度不高于八十厘米”的具体批示。然后,这一决定就比较快地付诸了实施,市园文局的动作算是麻利的,次年四月完工。墓地修缮得简洁大方,周围场地也清理干净了,断手断脚断头都没了踪影,墓碑是横的,高度果然没有超过八十厘米,书“刘大白先生墓”,沙孟海题的字。我们后来都去看过了,心里很是欣慰。在这一过程中,俞剑明副市长、省文物局的陈文锦副局长都表示了很大的关切,也去现场查看过。

当然,更高兴的是刘缘子老太太。一九九一年某一个春日的一个下午,我从外面办事回办公室时,忽然发现办公室上有一大盒包装精美的巧克力,问是怎么回事,办公室同事说是那位刘老太太刚才过来了,千恩万谢的,为了表达她的心意,特意送一盒巧克力给我。

我那时思想境界不高,马上拆封,让大家在夕阳里开开心心品尝了。那个年代巧克力还是稀罕东西,平常吃不到的,尤其是高级巧克力。要是现在,肯定是要先向领导汇报,确定送礼的性质之后再采取规范的处理方式,否则就很有可能犯错误,在做人的道德形象上立马断手断脚。

名家新作



女中学生油画  
孟晓云绘

在收藏界,人们习惯称康熙年制的瓷器为“老康”,把光绪年份制康熙的瓷器称“小康”。同样一个“康”字,但“小康”与“老康”不在一个等级上,价格也相差许多。

有人以为捡漏,把“小康”当“老康”买,打了眼。有人不识“老康”,误作“小康”出手,悔之晚矣。鉴别文物是需要有眼力的,眼力高低的根基是文化,文化内涵又重在熟悉了解历史。康熙是清代强盛之时国力似朝日向上,光绪则内外交困如夕阳残照。瓷器虽无语,无语胜有声。我听业内人士讲,比如“老康”的器皿如盘子很“硬”,重量大,像个硬汉子;光绪时期偏“肉”,整体发软,有点奶油小生的味道……

在承德避暑山庄,展有康熙用过的甲冑和强弓等,看一眼便知道玄烨强威猛大树迎风,若将这行头给慈禧套上,兴许连走路都费劲,更不要说纵马山野击熊射虎。若论治国,这位后朝君主比其先祖就差得更远了。

光绪与康熙,“小康”与“老康”。从君王到瓷器,从康熙大帝到窝囊天子,有些事情是学不来的。与其如此,倒不如脚踏实地从基础做起,不玩花活,不学皮表,不因热闹,不霍钱财。

人如此,事亦然。说来古时民间牌坊,多是上方恩赐或民众自发,真名实姓为某方面的典型自立。内容或表彰其功勋、科第、德政,或向世人昭示其忠孝节义。石牌坊,不同书籍。纸张易损,坚石不灭。故此,刻于牌坊上的人物、事迹包括书丹者及墨宝,需要经得起时间考验和众口评说。怕就怕草率出误差,麻烦就大了:竣工之可惜,存之尴尬。移之不动,立之添堵。可能也正因这一点,后来凡建牌坊,都十分慎重,少有“任性”。除新建庙宇建几道明示路经层层迎引,民间已少见耗费巨资大兴建牌坊之举了。

但“任性”者依然有。日前,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曝光了海南某国家级贫困县耗资1.3亿元建1.7公里87座牌坊群。最大的一座碑高达37.7米,上面群龙环绕、气派十足。但麻烦已接踵而至。且不说一个贫困县不该花这么多钱搞这么一个“新景观”,单说牌坊上题字官员有的已经锒铛入狱,就令建牌坊者十分尴尬:不富,有损

所谓。高中到城里上学,大街小巷都会碰到女同学,我拉着菜车在街上走,好像有个女同学看到似的,浑身犹如针刺火灼般难受,每次进城卖菜,很难为情。当然,有让女同学看到的时候。有一次,我到县城南关十字路口去卖西红柿,我心里直打鼓,生怕碰到班里的一位女同学,因为她们家就住在这街口。果不其然,那位女同学提个菜篮来买菜了,而且朝我的西红柿筐走了过来,我正在给买菜的人称西红柿,眼看就要走近我的菜筐了,我便扔下手里的秤和买菜的人,赶紧躲到了身后的商店。这莫名其妙的举动让那个买菜的人吃了一惊,直追我喊:“怎么了,怎么了!”我也不回答她。那女同学没看到这一幕,到我菜筐里挑西红柿,挑好西红柿发现没摊主,便大声呼喊:“这是谁的西红柿,这是谁的,人呢?!”那个没买到菜的人

紧张,因为我一位女同学的家就在这个巷子里。

我跟着大妈进了一个小院子,正巧迎面走来的就是我生怕见着的女同学。她是我座位后面的“小丽人”,粉红的脸,脸上两个小酒窝,一脸的甜蜜相。她的那种漂亮,是让男生多看一眼会害臊的漂亮。我俩都一愣,我不知道对她说什么好,我既是羞,也是难为情,恨不能脚下有个洞钻进去。大妈对女同学说,帮着称菜吧,我买了一车菜。女同学红着脸,帮我推车、卸菜,把秤递给了我,我的脸红得感觉燃烧起来了。我怎么好意思把菜卖给女同学家呢,我把秤扔到一边,对她母亲说,这车菜我不要钱了,送给你们吧。她母亲不知道怎么回事,说你脑子有问题啊?这么一大车菜,白送我,为什么?我指着她女儿说,我们是同学。她妈问她女儿,你们班还有乡下的啊?这话让我更无地自容了。我快速卸完菜,拉车就要走。她妈不干:同学归同学,菜归菜,称完菜、付了钱再走!我再说算了,她妈塞过来七块钱,我本来是执意不拿钱的,但想到这么一车菜没卖到钱,回家给父亲交了不赚,红着脸只好收下了。我看着女同学那张同样羞红了的脸,我的心羞愧极了,从那以后的很长时间,我十二分地憎恨我是乡下人的出身和处境。

让我产生憎恨我是乡下人的,不仅仅是卖菜让我在女同学面前产生的难为情和羞愤,还有“市管会”的那帮人。什么叫“市管会”?就是“文革”期间为了“割资本主义尾巴”,针对农民卖菜成立的“市场管理委员会”。他们的任务是,打击农民摆摊卖菜,把农民摆摊的菜收缴到国营菜店。“市管会”的人好像都是街上逛荡的痞子,对人凶神恶煞的。

让那女同学指着商店说,他钻到商店去了!那女同学挑了几个又红又大的西红柿,着急地朝商店边张望边喊:“喂——卖菜的,人呢,没人我拿走了!”她那尖厉的喊叫声简直像喊贼似的,吓得我脸发烫,腿都发软了。我多么希望她别喊叫,把西红柿白白拿走了算了。我生怕她跑到商店里来找我,我便躲到了商店的角落。谢谢地,她没有进商店找我,而是不高兴地扔下西红柿走了。我看她在别人的摊上买了西红柿,走远了,这才回到了我的菜摊上。女同学的出现,虽然让我少卖了好几个人,但我很高兴,庆幸自己躲过了让女同学见到我卖菜的羞涩和尴尬。

还有一次,我拉一车白菜去县城卖,是自家地里产下的鲜嫩的白菜。父亲交代,每斤白菜必须卖一毛钱。父亲知道菜市行情,也知道这车菜大体有多少斤,如若卖贱了,那是会发脾气的。刚进城,我的一车菜就被一位大妈全要了,九分钱一斤,她让我给她拉到她家。我进了这个巷子,就有点

# 『小康』与『老康』

何申

当地形象。昔吧,才建成就昔,大伤颜面。这正是,赫赫牌坊,斗字金描辉煌。乌纱顶冠,尚有“老虎苍蝇”? 群龙相问,竟不知下一个挨雷者,还会是谁? 倘若如此,又该如何是好?

如果把古牌楼比作“老康”,这新牌坊群亦可比作“小康”。“老康”石心石表重在教诲,“小康”水泥挂面喜饰华容;“老康”字字千钧方正可敬,“小康”行草混杂让人难认,“老康”人物过硬有口皆碑,“小康”雷同一色,不如表彰他人还是为自己树碑立传……

当下贫困县的首要任务是带领群众奔小康。奔小康的路子很多,没有必要像“小康”那样仿学“老康”,学也学不像。说是通过了各程序以后才建的,但明眼人一看便知道,若不是决策者“任性”,搞这么大的一个组不伦不类的建筑,且在建前就有反对的声音,又占了很多耕地,不可能说建就建起来。

“任性牌坊”如拿给鉴宝节目,专家会说:“是不是钱多得没处花了?”

# 南普陀素宴

李春

应,鲜藕是用糯食制成,中间藕节用黑色细如发丝的发菜捆扎,栩栩如生。低首莲瓣在眼,抬头壁上荷影轻摇,只觉“香远愈清,亭亭净植,可远观不可亵玩”。

接下来“竹影情长”,两根黄瓜雕成竹节,上插些许翠绿竹叶,盘中一个挖空的黄色竹节当盛菜器皿,中间是汤羹。窗外竹影婆娑,窗内竹叶依稀。瞬间散去,留一榻品尝。色犹在眼前,形转眼成空。

之后的“丝雨菇云”“半月沉江”“香泥藏珍”等皆菜如其名,清淡雅致,诗情画意,禅韵隽永。整个品尝过程,轻言慢语,连服务员都是静无声息地端菜、转桌、分食、撤碗。心中屡屡触动,却又不知其所起所终。

素菜平时也品尝得多,但是要就不是家常做法,青白菜蔬,豆腐杂粮,清爽寡淡;要不就是浓汤杂烩,做成素鸭素鸡素火腿之类,形色香皆惟妙惟肖。但前一种质朴本真,不事雕琢,后一种虽是素食,但还是脱不了凡尘肉食“意杀”之心,每每餐完,都觉得膏脂肥厚,味重舌沉。

南普陀素菜,素菜素做,素菜素形,出于家常,涵于修禅,形色皆雅,一餐毕,如全身浴。

不见街边小店烟火气,更不见平时酒宴的觥筹交错,衣香鬓影。不论小店喧嚣,还是酒店奢华,都免不了人走茶凉,宴散人离,杯盘狼藉的凄凉,所以性情中人贾宝玉最怕就是热闹后的宴席,孤单凄凉的人间晚景。人吃五谷杂粮,焉能没有喜怒哀乐?怎会不怕生离死别?所以,人间盼相聚也怕相离,种种纠结还是成全这一桌一碗碗食物的延续,南普陀素菜却在平常心中心点燃了佛家的慈悲与关怀,不仅在寻常中做出美感,而且在一食一羹中贯穿了禅意,或许是醍醐灌顶,或许是春风雨露,或许是水滴石穿。

突然如电光火石般想起鼓浪屿日光岩下弘一法师雕像前八个字“华枝春满,天心月圆”,其实是一偈语:“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顿时心中澄澈。此时,餐毕,服务员早已把所有杯盘撤去,桌上空无一物,环顾四周,窗外竹影摇曳,壁上清荷静默,四围花香,若有若无。



心香一瓣

我十七八岁的时候,最不愿意、最为烦恼的事情,就是去城里卖菜,这并不是因为卖菜是件苦差事。卖菜的确是件苦差事,卖得快,就能很快回家,不好卖或卖不掉,得熬到天黑才能回家,否则是无法给父亲交代的;卖得快,必然得卖得便宜才行,卖便宜了回家也没法给父亲交代。因而常常一天也吃不上饭,只能吃自带的馒头烧饼喝自来水而已。尽管是件很苦的事情,但也不是我因此而最不愿和最烦恼的原因。让我最痛苦的是怕碰到两种情况,一种是怕遇到城里的女同学,一种是怕遇到“市管会”胳膊戴红袖箍的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老家那个地方,是城里人乡下人相当分明的时代。我是个乡下人,但又在城里读书,班里女同学都是城里人,班里乡下人仅此一二,遇到这两个情况,对我来说是非常伤面子、伤自尊的事情。

怕遇到女同学,是因为那时的城里人比乡下人显得绝对优越,高贵,城里人吃国家供应粮,拿工资;乡下人,土里扒食,拿菜换钱,这就让乡下人比城里人低了一等,城里人完全看不起乡下人。怕遇到“市管会”的人,是因为那时全社会大兴“割资本主义尾巴”,政府不容许农民进城摆摊卖菜,上街卖菜是受打击的对象。轻者,没收菜,要不然就把你圈到一个地方给你办学习班接受教育批判。这两种情况都是折磨人内心的。

我家是城郊,以种菜为主,自留地里种的茄子、黄瓜、韭菜、白菜、菠菜、辣椒、芹菜、西红柿,那是从春天要卖到冬天的。菜到旺季,一天得卖两三种菜,否则菜就会烂在地里。我从八九岁就开始卖菜了。起初是我父亲带我卖,后来就让我一个人卖,直到上一天学卖一天菜的状况。家里不是没有比我大的人,还有母亲、哥哥、姐姐,他们都是可以卖菜的,

但最终还是推给了我。这是因为卖菜害羞,尤其让女同学看见。当然我也极力抗拒过卖菜的活儿,而且多次抗拒过父母亲的逼迫,但没用。我是孩子中的老三,说大又不大,说小又不小,比我大的哥可以对抗父母,父母拿他没辙,我就不行了,我要对抗,就得挨打。再则,那时家里人口多,我后面还有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都要上学,生活很困难。哥哥在读中学,还要接着读高中、大学,要缴学费,每周要拿生活费,父母把全家未来兴旺的希望又放在了他身上,且他的功课确实耽误不得,他拒绝卖菜这种活儿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尽管在读小学,在生活困难的现实中,在父母眼里的轻重量上,我是跟哥哥没法比的,父母让我去卖菜,我别无选择。当然,卖菜也有让我高兴的地方,那就是口袋里的零花钱比兄弟姐妹们多,且会源源不断,这使得我有时还很乐意。自从八九岁为家里卖上菜后,我们家卖了长达十年的菜,直到我十八岁离开家结束。

卖菜怕遇到女同学,那是上高中以后的事。我的小学和初中是在农村上的,女同学都和我一样是乡下人,感觉无

# 那个害羞的少年

宁新路

让他卖菜的逼迫。其缘故也是因为卖菜害羞,尤其让女同学看见。当然我也极力抗拒过卖菜的活儿,而且多次抗拒过父母亲的逼迫,但没用。我是孩子中的老三,说大又不大,说小又不小,比我大的哥可以对抗父母,父母拿他没辙,我就不行了,我要对抗,就得挨打。再则,那时家里人口多,我后面还有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都要上学,生活很困难。哥哥在读中学,还要接着读高中、大学,要缴学费,每周要拿生活费,父母把全家未来兴旺的希望又放在了他身上,且他的功课确实耽误不得,他拒绝卖菜这种活儿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尽管在读小学,在生活困难的现实中,在父母眼里的轻重量上,我是跟哥哥没法比的,父母让我去卖菜,我别无选择。当然,卖菜也有让我高兴的地方,那就是口袋里的零花钱比兄弟姐妹们多,且会源源不断,这使得我有时还很乐意。自从八九岁为家里卖上菜后,我们家卖了长达十年的菜,直到我十八岁离开家结束。

卖菜怕遇到女同学,那是上高中以后的事。我的小学和初中是在农村上的,女同学都和我一样是乡下人,感觉无

